

反
经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原 序	(5)
-----------	-------

卷一

大体第一	(9)
任长第二	(15)
品目第三	(20)
量才第四	(28)
知人第五	(38)
察相第六	(66)
论士第七	(98)
政体第八	(113)

卷二

君德第九	(130)
------------	-------

【藏书导读】

纵横学之无上经典，谋略家之第一范本。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地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譎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又名《长短经》，它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鸟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运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阖，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和百子争锋的场面，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

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驩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四库全书》总编纂清代大学者经晓岚称“此书是因时制动的事功之学，大旨主于实用”。

傅增湘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傅增湘（1872 - 1950），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傅增湘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曾任教育界多种要职。傅增湘藏书处名“双鉴楼”，以后又将北京的新宅命名为“藏园”。他从父祖辈继承了一些藏书，不过除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外，都是较普通的版本。傅增湘自辛亥革命后开始了他40年的书堆生涯，大约在1921年以后，便已成为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双鉴楼”最突出的收藏，是为数颇多的宋本，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本书多达180余部，比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多，平均每年新收10部，近代藏书家中没有第二人能与之相颉颃。1934年，他以1万余元买到的宋刊《周易本义》14卷，算是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1947年，傅增湘以藏园群书中的373部、约4300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估计价值在3亿元以上，政府则拨发4000万元作为象征性的奖金。1950年他逝世以

后，长子傅忠谟又先后将藏园遗书中的 480 部，约 3 500 册“无条件”地再捐给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宋元本的美富，固然睥睨一时，而傅增湘校读的精勤，也是一代之冠。他是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平生所校的书在 1 000 部以上。傅增湘对校勘有两点特别的看法：第一是重视而不迷信古本；第二是重视而不迷信前人。傅增湘编撰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他逝世后其门生韩敏修搜辑《藏园老人遗稿》3 卷油印行世。

原 序

赵 蕤

【原文】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

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

训而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慑的手段；强国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像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用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

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革除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要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卷

一

大体第一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

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为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候，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

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但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

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

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原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译文】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厌弃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